

顾颉刚的经学与史学

张京华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湖南永州,425100)

摘要:顾颉刚先生一生有志于经学研究,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主张古史研究以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的研究都要由经学入手,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但“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实际上是两难成立,在今古文两方面均少有创获,反而连经学原来据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致使其学术境界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关键词:顾颉刚;古史辨派;经学;史学;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K827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20-05

一、经学还是超经学

顾颉刚先生以史学名家,开创古史辨派。古史辨派分合错落,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学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

关于顾先生与经学今古文的关联,学术界曾有若干讨论,有“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及“顾颉刚是‘今文经师’吗?”等说法。杨向奎为顾先生弟子、古史辨派的成员,早在50年代对胡适思想及古史辨派的政治批判中,杨向奎即已提出顾先生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路说:“顾颉刚教授治学的方面相当广,他治过民俗学,民间歌谣,中国古代地理,以及中国古代史等,最主要的还是古史学和经学。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1]到1980年,杨向奎又著文重申了这一观点,更加细致地指出顾颉刚的代表著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用的是今文学派的方法,认为该文“是一篇内容丰富自成体系的历史论文,但它的影响不如《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它似乎没有在前文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它只是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又来和刘歆作对。如果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受胡适一派考证方法的影响,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却是经今文学派的方法,一切委过于刘歆”^[2]。

王煦华是顾先生1978年以后的助手,也认为顾

先生的主旨是今文学家言。王煦华说:“顾先生不是今文学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指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却全承袭了今文学家……但所谓刘歆改造之说,终究是清末今文学家有所为而发的一偏之论,常有意轻忽事实,流于武断……所以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必不能成立。……顾先生这书的主旨终究是今文学派一家之言。”^{[3](326)}

在此问题上,徐中舒提出了另外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徐中舒引用了顾先生早期的学术观念和发表于1980年的最晚近资料,一方面说明顾先生不可能是今文学家,另一方面又指出了顾先生沉于经学的事实,认为顾先生未能正确认清今古文经学的实质。徐中舒说:“过去有人说《古史辨》出于今文学派,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不足为凭的。……他对二千年来古史传说敢于作彻底的怀疑而对于今古文的问题终不能作科学的公平的裁判,这完全是受了钱玄同先生‘今古文两者都难凭信’的影响。钱先生因为不相信王国维先生《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进退失据,既不知古文之足信,又怎么能判断今古文的是非标准呢!”^[4]

笔者认为,顾先生不是经学传统中的经师,但是他对经学研究比较关注,也倾注了较多精力,他推崇今文家的研究方法,又认同今文家的辨伪观点,所以虽然他不是经师,但确实是走了经学的路子。

首先,顾先生一生在经学领域倾注了大量精力,投入了特别多的关注。顾先生自称“十余岁即有志

治经学,迄今已略识途径,拟将皮锡瑞《经学通论》加以注释,其不合处则加以纠正,成《经学通论补正》一书。倘能自作一《经学史》,当然更好”^{[5](282)}。20岁时,顾先生到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听章太炎在国学会的讲演,深受影响,表示“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学家”^{[6](26)}。不久,又上崔适的春秋公羊学课,开始点读《公羊传》和《春秋繁露》⁷⁽¹³⁻¹⁴⁾,对崔适“尊敬其人”、“益加怜悯”^{[8](321-322)}。其后,顾先生又结识了晚清经学传人钱玄同,曾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6](49)}顾先生对钱玄同始终盛赞有加,直到建国前夕仍有专函称赞钱玄同治学“实为超今古文的”,同时对其个人生活与狂狷性格予以赞赏,并表示愿意为其传记作补充^{[8](324)}。顾先生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背景亦完全从经学出发,正如顾先生自己所追忆的:“我的学术工作,开始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6](12)}

至于顾先生十余岁时便已有的作《经学史》的愿望,他始终没有放弃。1928年12月25日,顾先生在写给杨宽的信中,曾透露出希望与他合作撰写《经学史》的意思,其中说到他有“集合十人,工作二十年”的决心:“现在治文字学与历史学者甚多,而治经学者殆无其人。经学到将来固不成其一学,但在其性质尚不十分明了时,则必须有人专攻,加以分析。如廖平、皮锡瑞然。物希为贵,我甚望你向这条路走。我想,应做之事有几项……(六)作‘经学史’,为系统之叙述,以显示历代经学家之真相与其价值。此若干种工作,必须集合十人,工作二十年方可,我和你可先引其绪。如工作成绩能得好评,将来之成功可预期也。”^{[8](296-297)}

1949年至1951年前后,顾先生身处鼎革之际,仍潜心标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皮锡瑞《五经通论》,“现在研究经学人士寥寥可数,只沈凤笙、张西堂数君。予苟不为,则康崔之绪即断,故此后研究工作,必倾向经学,庶清代业绩有一硕果也”;“我辈生于今日,其所担之任务,乃经学之结束者而古史学之开创者。……必将经典弄清,中国文化史方能写作,否则识其外层而不能解其核心,于事仍无益

也”^{[9](235)}。1951年9月,顾先生还曾致信给他的老友王伯祥,洽商撰写《经学史》及在开明书店出版注释本《五经通论》一事,说“承兄奖借,令编《经学史》,此事弟极所乐为,且已立一骨干。……皮鹿门《五经通论》,抗战期中曾为标点分段,拟略加注释,……是亦《经学史》之前奏曲也”^{[8](294-295)}。

大约在此前后,顾先生还专门写有《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笔记,论述经学的重要性及他研究经学的自信,说:“中国古史问题,予能发难而不能竟事,盖学力与材料俱受限制也。惟今古文问题,则旷观宇内尚无视予为更适宜于作结算之工作者。经学纠纷至复杂,非一般人所能分析,而予则差幸略有修养,一也。清代后期,研究此问题者不少,材料已备,能集合之则易于得结论,二也。近人尊视古物,亦以其事径捷,无多牵缠,而惊经学为繁琐,相率以不谈今古文问题为高招,而予则既受业于崔觯甫先生,复问学于钱玄同先生,深知此为不能不解决之症结,有工作之勇气,三也。”由此亦可看出顾先生对于经学的倾重。

其次,在写《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时,顾先生对康有为、崔适等今文家表现出明显的推崇。在治学方法上,顾先生主要是来源于经学的,如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相。”^{[10](4)}在观点和结论上,顾先生也对今文家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如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的路。”^{[11](537-538)}“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11](552)}又说:清代今文家“揭发西汉末年一段骗案,这是不错的……议论虽有些流于苛刻,而大体自是不误”^{[11](631-632)}。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发表后,钱穆写了书评。书评发表后,顾先生为之写了跋文。跋文后钱穆加有注文,注文后顾先生又再加按语。二人于此可谓反复辩难。钱穆这篇评论共三节,结尾并归纳出十个问题,而全文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指出顾先生治学方法与今文家派的类同,指出:“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这一点,似乎在《古史辨》发展的途程上,要横添许多无谓的不必的迂回和歧迷。”^{[11](621)}“何以今文学家定要说明刘向云云尽是刘歆假托,而把

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要归纳成刘歆一人的罪状呢?遵守今文家法的人如此说,考辨古史真相的为何也要随着如此说呢?^{[11](628)}“今文学家本承著乾嘉正统经学而来,他们要讲家法,他们要上复汉经师专门名家的风气,他们因此摆脱不了门户之见,也尚不失为经学家一种本色,至于顾先生治古史,却不当再走上这条路。”^{[11](626)}

二、史学还是史料学

就顾先生一方面而言,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研究很快就由胡适所倡导的实验主义方法转变成成为今文家言。所谓“以今文打破古文、以古文打破今文”或“超今古文”之说,不是从学理上侧重领会今古文的学术精华,而是对于今文家和古文家两方面都缺乏创获,这就使得40年代以后古史辨派很快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钱穆曾经指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夫治经终不能不通史。”^{[12](6)}意谓当以史学包含经学。而顾先生的主张则是古史研究要由经学入手,顾颉刚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古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之一例)。此实存舍难趋易之心。”^{[8](291-293)}

由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来看,古代史学中本有“记言”与“记事”二种传统并存。《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由“记言”就发展出注重史鉴史论的一派,由“记事”就发展出注重良史实录的一派。自有史以来,这两派的风格在典籍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可谓平行发展。平心而论,无论微言大义、经世致用,还是实事求是、良史实录,都属中国史学中最优秀的学术传统。关于今文经学,钱穆曾举《汉书·雋不疑传》汉昭帝时假卫太子事件,雋不疑收捕之,帝及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义者”一段,说明《春秋》在汉代确实具备判断是非的效力,《春秋》之学确有超出儒学、史学而升至政治层面的“大义”。关于古文经学,胡适曾举出戴震《与王内翰凤喙书》考证《尚书·尧典》“光被四表”的“光”字本应作“横”、转写作“桃”、脱误作“光”的例子,说明一个假设有了充分的旁证便升上去变成了一个真理。

准此而言,不但顾先生要将经学引入史学的目标不能实现,其“超今古文”理想的也不能成立。既然

连经学原有的高度也难于保持,其所谓经学研究最终下滑到了史料学的层面。

虽然胡适自称实验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不是理论,但是它实际上可以导出自己的价值判断。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到新文化思潮以及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影响,所从事的整理国故和疑古辨伪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思想革命的意图。顾先生提出推翻非信史需要打破四个观念,并且经常使用“攻倒”“推翻”“破坏”等词语来说明他的治学方向。加之在个人性格特点方面,顾先生也屡屡提到,“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6](8)}、“我的根性是不能为他人作事的”^{[6](51)}、“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6](81)}等等,说明他的学术思想从一开始就与实验主义及胡适的思想貌合神离。

到了1930年前后,顾先生面对学界的种种议论,开始反复强调他学术分工的主张。开始时是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顾先生说:“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所有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闢出许多新园地。”^{[13](4-7)}在顾颉刚看来,辨伪学和考古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领域。考古学的研究是有局限的,在某些方面,例如三皇五帝的事迹,考古学就永远不可能找出证据。而辨伪学的研究是可以独立开展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尧舜禹的事迹,辨伪学可以拿出唯一的证据。辨伪学是基础,而考古学是第二位的;辨伪学可以不依赖于考古学,而考古学却一定要依赖于辨伪学;要先有辨伪学的成就,然后考古学才能获得成就。

然后是开始时是辨伪学与史观派的分工。顾先生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14](22)}又说:“考古学的成绩一日千里,唯物史观又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我以为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

本上的史料。”^{[15](210-211)}

和20年代初“在史学上称王”、“所据的地位在中央”^{[13](298)}的状况相比较,古史辨派的学界中所处地位与所发生的影响都已大不相同。在顾先生顺利进行他“结束经学”工作的时候,他是以史料学、考据学的面貌出现在学界中的。如果说顾先生的这一观点确实具有考虑了专业不同特点的合理性,而到30年代初史观派兴起并逐渐进入史学主流时,顾先生所重申的分工观点就略带有些自守的倾向了。无论从实验主义的角度还是从今古文经学的角度,这当然不是顾先生所期望的。对于极具个性的顾先生来说,这实在只是他学术自守的最低“下限”而已。

颇耐寻味的是,到50年代初,当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方法受到政治性的批判,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研究也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时,顾先生一面极力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一面再次将其学术研究解释为史料学或考据学。当时学术界包括顾先生部分好友在内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目的似在于给顾先生以政治保护。《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一条题为《〈古史辨〉与史料学》的学术笔记中记载了方诗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书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18](248)}顾先生称此语“似颇公允”。据方诗铭所说,当时对顾先生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又据《顾颉刚书话》中一条题为《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的笔记记载:“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顾先生于引文后加按语说:“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15](269)}可知当时他自己也是使用的史料学的术语。

1956年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所谓‘古书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16](145)}到1993年“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官方的结论性评价。^[17]其得失冷

暖,说者自知。

早先梁启超评价康有为,只称:“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18](127)}钱穆也有评价说:“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于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12](6)}“既不重政治,又不重教化,把自身躲闪在人事圈子外面来讲经学,虽说他们的训诂考据,冠绝古今,其实是非宋亦非汉,他们纵有所发明,却无关于传统经学之大旨。”又说“既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学,把西汉《公羊》家此两种经师都放松了,此即成为后起之经学。其实这样来研究古经籍,则‘经学’也只成为一种‘史学’了。”二人对晚清今文经学的论述,也可以借而评价顾颉刚先生。

按钱穆此语尚别具深意。盖此处所说“史学”尚非王官传统,而指当时习语的“史料审查”即史料学。由学术渊源而论,经学本出于王官学,而王官学本为五史职守,此即章学诚“六经皆史”之义。

史学与史料学有别,但现代学者多解“六经皆史”为史料学之史,如周予同曾说:“章学诚所叫出的‘六经皆史’说,在我们现在研究的阶级上,也仍然感到不够;因为我们不仅将经分隶于史,而且要明白地主张‘六经皆史料’说。”^{[19](622)}这一认识代表了当时乃至今日相当部分学者的共同观点。而章学诚的所谓“史”,即专指上古三代史官史职之制而言。“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20](1)}这一“史”义乃是对于史学的最宽泛也最根本的定义,而与后世“入道见志”及作为“私学”的诸子之学相对称,所以它是“向上”的追溯,而不是“向下”的演绎。章学诚所倡导的是由刘向父子之“部次条别”,上溯到《周官》“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胥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21](42)};由“群书之部次”,上溯到“官守之分职”;由秦人“以吏为师”,上溯到“三代盛时”^{[20](2)};其实正颇有钱穆“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11](618)}的味道。

顾颉刚对于“六经皆史”的阐释却是“向下”的。1948年他在兰州大学讲学时说:“从前学者认为经书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经便变成了史料,再无什么神秘可言了。”^{[22](13)}这里不但没有上溯先王,而反下降。顾颉刚还曾说过,他“现在忽然有了这样一个觉悟……书籍是可备参考而不必作准绳的,我顿觉得旧时陶醉的东西都变成了我的腕下的

材料”^{[6](25)}。既然六经都只是史料,自然就可以任意择取乃至剪裁,又可以随时予以重新审读,或真或伪,而完全不具有“真理”的力量了。

现代学术体系中一个不同于古代学术传统的特点,就是反对乃至于毁灭学科的人仍然可以成为这个学科的专家。要之,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虽以史学名家,而却往复于经学之间,又前后两次以史料学定位,其进退失据之意不难概见了。

参考文献:

- [1]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J].文史哲,1952,(3):34.
- [2] 杨向奎.论“古史辨派”[A].中华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 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 [4] 徐中舒.经今古文问题综论[A].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C].成都:巴蜀书社,1990.
- [5] 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7]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8] 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 [9]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0]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11]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2]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3] 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4] 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5]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 [16]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A].胡绳.枣下论丛(增订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17] 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J].学习与探索,1994,(3):4-5.
- [1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9]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A].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0] 章学诚.校讎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21] 章学诚.文史通义[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22] 顾颉刚.中国古代史研究序论[J].文史,2000,53,(4):13.

GuJie Gang' (顾颉刚)s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ZHANG Jinghua

(Lianxi institute,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006, China)

Abstract: GuJie Gang devored his all life to Confucianism research. He held in esteem for the research way of Schololor in Jin Wen and also accepted the viewpoints of Schololor in Gu Wen in discerning the false from the genuine. He hold that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study of Archacology, Paleography, Ethnogeny should start from Confucianism. Though he was not a professional at Confucianism, he did lead his way to it. But the theories can not come into being both by “using modern prose against ancient prose or ancient prose against modern prose” and “beyond modern prose and ancient prose”. With less originality, it was even harder to keep the former stage of Confucianism, instead, making his academy status decline to the Historiagraphy level.

Key words: GuJieGang; School of “Discussion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Confucianism; Historiography

[编辑:颜关明]